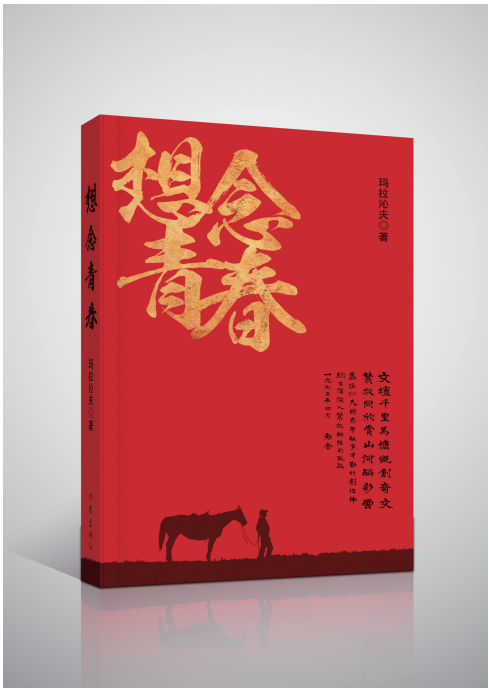


“没有春天,咱们会去创造!”

——忆老舍先生

□玛拉沁夫



编者按 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战线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是“草原文学”流派创建人之一。他的作品《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茫茫的草原》《花的草原》《草原英雄小姐妹》《活佛的故事》等曾多次获得多种奖项,并受到老舍、茅盾等文学大师们的赞扬。一首《教包相会》传唱至今……

玛拉沁夫的散文集《想念青春》以抒情的笔调描绘了祖国大好河山和世界各地风情。书中描述了作者的创作之路与浪漫情怀,哲思大气的文字跃然纸上,把读者带进了他的散文世界。

我听说老舍先生死去的消息时,我自己也正在生与死之间搏斗着。我已失去自由。有一天我们一起劳动的一位同志,背着看守人员悄悄告诉我:“听说老舍死了!”当时,我只有惊愕、悲愤、两眼泪的沉默……那时候,社会上很乱,各种消息纷纷纷纭,有真有假,我只希望那位同志告诉我的是后者。后来,老舍先生的一位亲属到内蒙古来插队,我从他那里证实到那个消息是真的。真的我们再也见不到那位可爱的老人了!但那时,我已经没有眼泪了,我只是紧紧地握了握老舍先生那位亲属的手,别的,能说什么呢?

老舍同志是我们文学界的老前辈,大家出于对他敬重,平时总是称他为先生,就像对鲁迅先生我们从不曾叫过鲁迅同志一样。

大约在1955年春节前后,我曾给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副主席周扬写过一封信,呼吁中国作家协会对全国几十个少数民族的文学情况

我是健康的病人

遇到坎儿的时候,别人拉你一把,你自己加把油就过去了。如果你自己不努力,别人再怎么拉也没用。

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患有肾脏肿瘤,是在1994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得知的。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我参加了一个中央领导接待各方人士共度佳节的晚会。会议结束后,我突然感觉眼前有重影,看不清台阶。刚开始还以为血糖病造成,可前往医院检查后排除了这个原因。后来通过CT检查才知道我得的是肾癌,当时一下就蒙了,那年我56岁。有10天的时间我都在想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后来慢慢熬过了那段时间。

面对可能的死亡,我天真地想,黄泉路上无老少,6岁、26岁、46岁、56岁……多大岁数的人都有,赶上哪岁算哪岁,烦也没用。我活到56岁,做了很多事情,一不靠走后门,二不靠投机取巧,好歹是自己干出来的。我没有出卖过朋友,也没有欺负过弱小,心也坦然。毛主席吃过的最好的东西听说是红烧肉,我吃过的好东西好像比他多呢!他出过两回国,都是莫斯科,我没去过莫斯科,可去的国家比他还多几个!他也会“老”,乎我我这平凡的生命?这么想想,也就过去了。

后来的肾癌出现了转移,转移到了肺。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一台晚会需要一个作家朗诵诗歌,他们选中了我。我在家排练节目时嗓子里咳出血,开始还以为是用嗓过度,后来才知道是癌症转移。不过那会儿我在思想上已经很积极了。准备开刀手术之前,医生们研究具体手术方案是当着我的面讨论的。

我曾看过一部美国电影,里面的男主角是一位骨癌病人,大夫说他的生命只剩下半年时间了。他说他在这宝贵的半年时间里完成三件事:第一,他曾当过中学篮球队的教练,他希望回去带领他的篮球队再拿一次冠军;第二,他希望去见一个朋友;第三,他想和妻子再做一次爱。也许我们中国人无法理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可我很尊重他。因为他完成了他的三个愿望。我在得病期间的心态和这个人有些相似,我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当时我的两位主治大夫告诉我开刀后多少天可以起来活动,我就遵守他说的时间进行调养,也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我非常感谢这两位医生,他们让我始终处在一个非常明白的过程中。

那个时候我完成了很多事情。我写了很多文字,写到现在,差不多有200多万字了,出版了七八本书。记得刚得病那会儿,我每天都打针、吃药、做气功,日晷一日,觉得生活特没意思,好像永远都是这些事情。今天吃药、打针、练气功是为了明天练气功、吃药、打针,这样的日子不如少而有质量的生活更有意思。1994年我做了左肾切除术,8年后,我的癌细胞转移到左肺,我又做了左肺叶切除手术。手术后,我积极配合治疗,每天吃几大把药,我把它当做功课。又过了两年我的脾脏又有了癌肿,我又做了大剂量的

我和病魔一起“玩”

□苏叔阳

放疗。我从未丧失对生命的信心。我照样快乐,该玩的时候照样玩。我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生活是可爱的。

仔细想想,病对应着不病,就像假恶丑对应着真善美。假如没有假恶丑,你就不知道真善美是什么样的;假如不生病,你就无法体会健康的宝贵。我是在得病之后被选为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的。工作上有一些事情需要出头露面,有的人说,你这么大多数人的事,身体又不好,还这么辛苦干什么?其实他不理解我,我不是为了出风头,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热爱生活。

一个生病的人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路就是被病魔压制住。我有几个病友就是这样,其中一位每到吃饭的时候就靠着墙哭,因为放疗期间,吃饭是很难受的。可我的态度是吃不下也得吃,我还给他说话,架着他去吃饭。后来我出院了,可他却没能出来。第二条路就是积极地对待。我有一位老同事叫王尧华,是东方医院外科主任。他自己得了肺癌,可他非常配合做化疗,心态很乐观。在化疗期间,他还依然在岗位上坚持工作。他说医生的职业道德让他知道应该怎样对待这个病,他应该做其他病人的榜样。

自我健康管理,我的体会是:人的生命至少有一半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的。如果得病以后你能够正确对待它,那么在遇到坎儿的时候,别人拉你一把,你自己加把油就过去了。如果你自己不努力,别人再怎么拉也没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没觉得自己是病人,也没把自己当成一个70多岁的人。我觉得我还年轻,活得很健康。虽然我得病了,可我看得开——反正已经这样了,干脆把病当成生活中的一个朋友,一起玩呗!我想我应该是健康的病人吧。(2009年)

病中情味——树叶

病房里最强烈的情绪便是对生命最浓最执著的爱与追求。过去我不懂这个,以为医院总与死亡挂钩,现在我明白了,没有对生命的热爱,就没法儿整天面对死亡。

我几乎没有想过,一片树叶会有这么多的变化和色彩;我也从没留心过树叶对于树木的装扮有多么丰富。第一次住院之前,活了50多岁还没有空儿整天瞧着同一根树枝发愣。

住进医院,从春到夏,我守在一个窗口,盯着一根树枝,从早看到晚。春节刚过,春天到了,但暖风还待在老远的南方,树枝可是等不及了,它们早已忍耐不住一冬的僵挺,急忙忙攒足了汁水从根到梢让自己活软起来。杨蕊像一群醉不了寂寞的猴子一个个蹲坐在枝头远望着北来的风头。

白天,我眯着还散发着冷光的太阳底下那肌满枝头的杨蕊,它们好像不断地伸长着身子来迎接春意;夜晚,路灯又把它们的影子送上来迎

陪我们坐。我们为打断了他的文思而有些不安。他好像看出我们的心情,就想法子使我们松弛下来。他给我们说笑话,讲故事,乃至翻箱倒柜找出各种珍贵字画来教我们欣赏,他自己兼作讲解员。有一次他拿出一个很精致的鼻烟壶送给我,指着那个鼻烟壶上烧的画,风趣地说:“你看,这鼻烟壶上画有两峰骆驼,大概是从你们蒙古草原拉来的,还是你把它它们牵回去吧!”那个鼻烟壶,我一直珍藏在书架里,前些年各种“战斗队”经常来抄家,也不知道哪一帮人把老舍先生送给我的两峰骆驼给偷走了。直到今天,查无着落,只得作为终生憾事,记在心中。

除在夏季之外,每次跟老舍先生约会,他总是叫我在下午四五点钟去看他。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为了谈一会儿话之后,好留下来一同吃饭,而不是在他家里。他考虑到我们蒙古人爱吃羊肉,所以每次都是他先站起来,对夫人胡絮青说一声:“该走了吧!”于是老舍先生提着手杖由胡絮青同志陪同,领着我们走出家门,直奔“东来顺”,去饱餐涮羊肉。

陪同老舍先生走在北京街头上,那是十分有趣的事。在这里,我只提两件事:

头一件是,街上认识的人太多,迎面走过来的许多人都停下来,按照北京人的习惯,向他弯腰鞠躬,用纯粹北京土腔儿这个那个地寒暄个没完没了。这个刚离去,那个又过来了。有的是街坊邻居,有的是故交老友,有的是弹琴唱戏的,有的是磨刀卖肉的,有的是蹬三轮的,有的是大学教授。本来从他家到“东来顺”,路很近,但没有个把钟头,你休想走到。我发现北京人是这样喜爱和尊敬老舍先生,而老舍先生又对他们每个人都是那样以诚相待。不管你是粗声大气的磨刀人,还是著名教授,他们对他们的态度,全一个样儿。当我们陪着他好不容易来到“东来顺”时,服务员总是迎上前来,把他请进一个单间里。那间屋的墙上挂着一幅画,是由胡絮青作画,老舍题词的。

另一件是,跟老舍先生走在北京街头,你会一路上像读《天方夜谭》那样,听给你讲许许多多有关刚才路过的街道、胡同、房屋、院落的变迁与趣闻。他把古老北京的生活风貌与历史画卷,一幅幅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一边听他讲述,一边暗自想:老舍先生对北京是那样熟悉,怀有那样深厚的感情。像他那样热爱北京、热爱北京人民的人,怎么会想到死?而且会死在用他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的才华绘声绘色地描写与歌颂过的北京大地上!这种历史悲剧,难道使我们每个熟悉老舍的人能够保持心灵的平静吗!

有一年秋季,老舍先生约我和我们蒙古族老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同志,到他家里去赏菊。老实

我和病魔一起“玩”

□苏叔阳

头,在风里跳跃着,颤动着,好像互相传告春风已经到了什么地方。

我头一次这么痴迷地猜想:杨蕊也必定有它们的“语言”系统,彼此商量着怎样舒展身躯。不然,它们怎么会长得差不多呢!

病房里极静,日日夜夜只听得见窗外的风声,假如如有风的话。北京的春天多风,过去令我厌烦。可在病房里,却盼着风声,盼着有树枝在风中敲打窗扇。因为这告诉我,自己还向往活生生的世界,窗外便是一个忙碌活泼的天地。安静,有时便是寂寞;而寂寞有时就是孤独;孤独,自然有高下之分,然而再崇高的孤独也还是孤独,令人难耐,有时便是惩罚。没病的时候,总觉得身边太乱。窗外是小贩们野调无腔的吆喝,还有汽车连绵不绝的吼叫。间或有孩子的吵闹,夹着头顶上的邻居击打地板的喧嚣。有时烦得恨不得大叫一通。

在静静的病房里,风声就变成了音乐,变成了命运交响曲。树叶、花蕊就是生命的精灵。它们每天探头探脑地从窗外向我问安,我还好意思不给它们一脸好气色吗?我还好意思不使劲儿地活着,一天天结实起来吗?

杨蕊真是贪食,几天的工夫就长大,从枝头吊下身子,常让我想起猴子捞月的故事:那些从水里捞月的猴子们大概就是这模样儿,脚钩着树枝倒挂身子。小时候管这杨蕊叫“杨树狗子”。它们可不是像狗,像猴儿,真的。小时候淘气,捡起落在地上的杨树狗子,插在鼻孔里成为两络紫檀木色的胡须,背着手在人前走来走去,神气一番。那时候说什么也想不到自己会老,更想不到自己老了会成什么模样儿。才几天,多少时候,咔嚓一下,我老了,满头华发,婴儿似的躺在病床上望着窗外的杨树狗子。

终于听见了沙沙的春雨声。往日里春雨真的像听不见了。因为哪怕是再细微的市声也盖过了春雨润物的声音。今儿听到了,春雨就算被撕成粉末轻洒在杨蕊、细枝上,也还是有让我听到的沙沙声。还有杨树狗子在雨中坠地的声音“吧嗒”、“吧嗒”,像是通知我:“嗨,来了,春天真的来了,不蒙你!”

我听着春雨的脚步声,想象着一地湿湿的杨树狗子,不知为什么竟会有湿冷的泪珠爬上了睫毛。从知道自己得了那个被认为是什么症的凶险之病起,我可是没掉过眼泪呀!我知道掉眼泪没用,病不怕这个。可为什么外头下起雨,我眼里却湿漉漉了,是春天惹的祸,它让我想从病床上跳起来去外头淋一淋。从今儿我当更喜欢春雨。

一夜春雨,清晨看窗外,不是“绿肥红瘦”,而是一两点鹅黄翠绿蹲上枝头。那杨树叶子的小模样儿,真是喜人。一个个像涂了油的小娃娃,躺在摇篮里伸胳膊蹬腿儿。你们好哇小叶子!你们比花骨朵儿还受宠,它们没有你们这份油光亮。

说,我对花卉毫无知识,只能大略分个这个好看那个好看。我们应约而去,一进院门,就看见老舍先生在灿烂的秋阳下,挽着袖子给几盆菊花松土。他穿着一件肥大的中式便服,像个老园丁。他见我们进来,放下手里的活儿,拍拍了两下手掌,说:“脏,就甭握手了。”便领我们走进客厅。老舍先生平时写作是在另一间屋里。客厅沙发上蹲着老舍先生喜爱的那只老猫。他把它抱起来,开玩笑地说:“来客人了,让开座吧。”(后来这只猫被街坊给杀了,老舍先生曾几次愤愤然提起此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还在某杂志上专为此老猫的被害写过一篇文章。)

老舍先生的客厅格外别致,沙发后面,贴墙全是繁茂盘结的奇花异草。墙上还挂着几张名贵字画,其中有一幅画的是河边垂柳在秋风中轻轻摇摆的萧瑟气氛,记得是出自宋朝某人之手。老舍先生特别喜欢这幅画,给我们讲解那几枝垂柳长须的画技之妙处。而后他领我们到花房去欣赏以他自己辛勤劳动培植的几百盆菊花,走在那花海中,就连我这个不会赏花的人,也都心里发痒,想猫儿几句赏花诗来。老舍先生在他的《赏菊》一文中曾说:“我爱花,所以也爱养花……可我还没有成为养花专家……我更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实际上,老舍先生称得上是养花专家,特别是他的养菊,在京城中是颇有名气的。但我觉得他不但是一位养菊的好园丁,而更重要的是,他在我中国文学园地中是一位勤奋超人的园丁。姑且不说他解放前所写的那么多而且有影响的作品,就说他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从国外回来以后,十几年当中所写的作品,其数量之多、质量之优、影响之大,在全国文学界中是名列前茅的。只剧本这一种形式,他就写了23部,如《龙须沟》《方珍珠》《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女店员》《西望长安》《红大院》《柳树井》《茶馆》等,此外还有长篇小说、杂文、散文、诗词、曲艺、评论等等。

他担任着各种社会职务,工作十分繁重,可是他还能写出这么多的作品。我在敬佩之余,有一次问起他的写作习惯。他回答说:“我有一个长处,一个字:勤。勤看,勤想,勤写。有了这个勤字,就能细水长流。我没有一天不写,可每天也写不多,我给自已定了条宪法:不得少于500字。”每天至少写500字,那么多到多少字?他没有说。

他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这样写道:“我勤,因为我心里高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怎能默默地低着头,不和昂首阔步前进的人民一同欢快地工作呢?这种自觉的劳动是欲罢不能的。它使我感到光荣,得到愉快。”他又写道:“‘大地皆春’已不再是空话。‘万古长青’也落了实——从今年起,中华民族必永远生活在春天里。没有春天,咱们

会去创造!”

社会主义的春天,就是他创作力量的源泉。出于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爱,他旺盛的精力、激昂的心情和强烈的责任感,像一团火一般地燃烧。这就是我所认识的老舍。

老舍先生不但勉励自己“和昂首阔步前进的人民一同欢快地工作”,也鼓励我们要像“千里马”一样“慷慨”驰骋。

1963年春,老舍先生曾给我寄来一幅题词:文坛千里马 慷慨创奇文 农牧同欣赏 山河丽彩云

玛拉沁夫同志壮多才勤于创作体验生活 深入农牧献短句致敬

老舍
一九六三年四月

在这一题词中,有对我过誉的词句。我深知那位善良老人的本意不是要我骄傲,而是表达了前辈作家对一个后来者的热切期望。

我把这个题词裱装起来,一直挂在书房里。到了前些年,“四人帮”兴妖时,内蒙古文学界的几个败类夺了内蒙古文艺界的权,搞所谓“×××反党叛国集团黑干将玛拉沁夫罪行展览”时,将老舍先生给我的题词,划上红“×”,作为我的“反革命罪证”,挂在展览会上。这时,老舍先生早已含恨死去,但他在九泉之下哪里会知道他还在人间无辜为我“陪绑”呢?每一想及此事,就越发加深我对老舍先生的怀念之情,同时我也越发感到对不起他九泉之下的英灵:不该由于我的株连而在他死后还在他那光辉的名字上面划着红“×”!

后来这个题词丢失了。近几年我一直想方设法寻找它,但毫无线索。这是我的一件很大的心事。

去年夏天,去北京出席全国文联扩大会议,见到了老舍夫人胡絮青同志,我把老舍先生题词的丢失经过给她讲了,胡絮青同志当时就说:“你别着急,让我从老舍日记中查一下,如果能查到题词的原句,我一定仿老舍字体,给你写一幅寄去。”

从北京回来不久,胡絮青同志来信告诉我,她已从老舍日记中查到了题词原句,并随信寄来她的仿文一幅。收到此信,我总算得到了一点安慰,把她的仿文正要拿去裱装时,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老舍先生给我题词的原件竟然找到了!原件的裱装均已损坏,幸而字迹部分尚完整无缺,但是当我把它整个展开时,突然看见那个大红“×”像一条血迹一般仍然划在上面,划在我的名字上面,也划在“老舍”二字上面!这血迹一般的红“×”,是那样刺我的眼,刺我的心,窒息我的呼吸!我情不自禁,眼泪夺眶而出!老舍先生,您含恨死去已经12年了,可在您那光辉的名字上由那些无耻之徒划上去的红“×”,却还没有抹掉!敬爱的老舍先生,我对不起您!但是我要擦干净眼泪,大声疾呼地问一声: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在我们这样伟大而可爱的国土上,会发生这样一些永远不能使人心灵平静的事情呢?

(摘自《想念青春》,玛拉沁夫著,作家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

去治疗。

Z医生告诉我,小鸟出来了。我急忙去看,只见树叶间,一只小鸟飞来,在那鸟巢中齐刷刷伸出四只张大的鸟嘴。

就在这一天,那屋的病友去了,走得匆匆忙忙。也许是最后一刻他也瞥见了那刚刚出世的小鸟,他带着生命的礼赞走向另一个世界。

我知道,病房里最强烈的情绪便是对生命最浓最执著的爱与追求。过去我不懂这个,以为医院总与死亡挂钩。现在我明白了,没有对生命的热爱,就没法儿整天面对死亡。树叶、小鸟、雨水、风声,所有从活泼的世界捎来的信息,都给人人生以力量,让死亡倒退。

我知道我正在步入老境,但老并不意味着应当对生活失去兴趣。生理的衰退远不如心理上的老化令人可怕。我的病友们许多是经历过几百次战阵的老兵。谈起凶险的病症,如同谈起“老朋友”。有一位还真的这么称呼自己的病,说起难以忍受的治疗反应,更是轻松得如同玩一次过山车,要的便是那份刺激。都说中国人怕病怕死。我看在大限面前的那份儿豁达、那份儿从容,谁也比不上我的那些病友,他们之所以瞧得上我,愿意跟我像讨论电影似的讨论病情,大约是我受了他们的感染,没有哭鼻子吧。

当窗外的树叶终于撑起一片浓荫时,我走出了医院。痊愈与否,交给命运,交给好运,我拥有的是自信与期望。就算是梦想,难道我没权利做个好梦吗?

就算我是根干枯的枝条,毕竟度过了所有的季节,不论是翠绿还是枯黄的树叶都会在我的枝头装点出一幅好的风景。(199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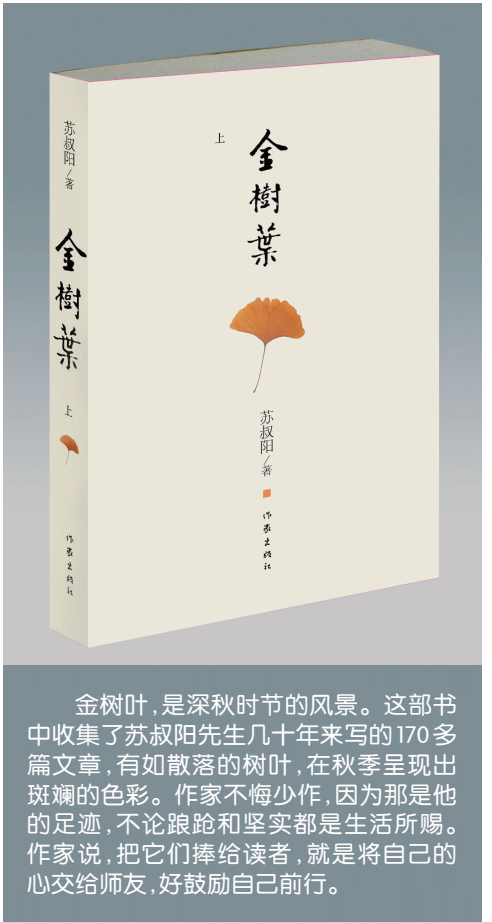
给老年朋友的建议

●大凡痛苦多于快乐的人,都习惯于自己和社会较劲。这并不是说不应同陋习、恶德作斗争,并不是要你别随波逐流,而是盼你清醒,不把自己看得过高。再污浊的社会也会有真善美,也有爱意弥漫。空泛地呼唤“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自然没有实际的意义,但整天看别人群运气,处处都不顺眼,那便是自己为自己开一张通往地獄的通行证。生病的好处便在于让你自己切实知道,你真的没有什么了不得,一场不大不小的病便可以把阁下撂倒。少一份自得其其实多一份快乐。

●有了病,就去查,就像去查朋友。因为老了,病也就不请自来。不把它当朋友,它就把你当敌人。哭和叹息都赶不走病痛。不如笑对疾病,心宽一寸,病退一尺。这是我的经验,不属于“站着不腰痛”的轻松话。我历来不爱说自己得病的事,因为别人听了堵心。这次说出来,是为了那些一老就悲观,总觉着明天就告别人间的老朋友。

●老人应该按照自己的条件,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框架内,进行适合自己的活动。快乐一点吧,让咱们拉拉手,在咱们没有经历过的大好天地里,尽兴地度过我们的余生,把所有的智慧和才能贡献给我们的国家、民族和我们的后人,那是多么有意思的事啊!

(摘自《金树叶》,苏叔阳著,作家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



金树叶,是深秋时节的风景。这部书中收集了苏叔阳先生几十年来写的170多篇文字,有如散落的树叶,在秋季呈现出斑斓的色彩。作家不悔少作,因为那是他的足迹,不论踉跄和坚实都是生活所赐。作家说,把它们捧给读者,就是将自己的心交给朋友,好鼓励自己前行。

当叶子像婴儿般攥着拳头的时候,我被推进了手术室,去经历一番大限的预演。当我从麻醉中醒过来,伴着剧痛,窗外又飘进滴滴答答的春雨声。这一回,雨打嫩叶,声音更好听,弄得我简直不敢呻吟,怕这呻吟搅乱了生命的乐章。

三天以后,在一片树影婆娑中,我被护士推着走过春天的树下,回到我的病房,歪头往窗外一看,好家伙,齐刷刷一排下巴掌似的杨树叶子在窗外招手,它们长得可真够实实。

Z医生告诉我,在那间病房的窗外,有一对筑巢的喜鹊,正在加紧工作。昨天晚上它们搭起的第一根树枝让风吹掉了,可它们还在搭,今天一早,她看那鸟巢已经搭起了基础。

我忍住痛,一步步蹭向那间病房,去看望那屋里的病友。他和我一样,都招惹上同一病魔。他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了。我也不便告诉他我是怎么了,蹭到他室里硬挺起腰给他一脸笑意。为了看那对相亲相爱携手劳作的鸟儿,为了不让病友跟我一块儿痛,我只好委屈伤口。

噢,那可爱的鸟儿真不赖。一个接一个飞上飞下,衔来树枝在那枝丫之间。那可怜巴巴的小巢在风中摇曳,可是不敢掉下来。大概有半个钟头吧,它竟然加高变结实了,直到鸟跳进去只能看见它高昂着的小脑袋儿。这些小精灵真是了不得。

树叶一天天长大,变得浓绿,变得稠密,我也一天天长起来,竟然可以自己走到病房外